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全球化台北的都市再發展策略之文化表現—台北市北大同文化園區計劃與大同新世界公共藝術方案的形成與執行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Strategies for Urban Redevelopment in Globalizing Taipei

doi:10.6154/JBP.2010.16.001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16), 2010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16), 2010

作者/Author : 夏鑄九(Chu-Joe Hsia)

頁數/Page : 1-1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10/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2010.16.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全球化台北的都市再發展策略之文化表現— 台北市北大同文化園區計劃與大同新世界公共藝術 方案的形成與執行*

夏鑄九**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Strategies for Urban Redevelopment in Globalizing Taipei

by

Chu-joe Hsia**

摘 要

本文關心全球化台北對老市中心與內城的都市再發展策略，以及與此相關的公共藝術的文化表現。作者先說明 2004 年 4 月，面對全球城市的社會吸納與排除問題與空間隔離陰影，台北市政府為了「翻轉軸線」，有意識地提出了都市發展策略，著手推動「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本文就計畫形成的脈絡、主要內容、執行過程，提出分析。由於所謂的「儒道文化園區」計劃本身技術層次的疏漏，廟學宮三位一體的構想，是典型的實質環境決定論產物。再加上過份脫離現實，缺乏對計畫內容方面制度設計的支持，因此，在可預見的，更新區居民反彈與市議員群連續施加政治壓力之後，市長的政治意志經不起衝撞，計畫的執行就顯得後繼乏力，以致於局長們紛紛退縮。於是，除了少數實質工程尚在進行之外，文化局在大同區的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幾乎成為被遺忘在戰壕裡的單兵。然後，作者進一步說明衛工處在業務上的配合、文化局基層官員全力以赴、策展人以

2006 年 6 月 2 日收稿；2008 年 8 月 30 日第一次修正；2009 年 2 月 27 日通過。

* 修改前論文曾發表於第二屆海峽兩岸新經濟地理學學術會議，2005 年 6 月 20-22 日，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主辦。本文議論的主要觀點曾經以不同的題目演講：夏鑄九(2005)，全球化台北的都市發展策略？台北的再公共化空間，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2005 年 4 月 8-9 日；Hsia, Chu-joe(2005), “Redefining the Publics: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Strategi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Globalizing Taipei”, public lecture in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pril 22.

**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Hchujoe@ntu.edu.tw.

及公共藝術各個案的表現。最後，在結論中，作者提出對執行過程的反思與一點對空間象徵的討論，分別就：公共藝術策展人的新專業角色潛力與解除危機作用，以及文化局的制度性推動作用、資本主義城市的文化邏輯與藝術家的張力與潛力、公共藝術是摸索藝術與社區互動的理想還是一廂情願的文化騷擾、公共藝術的新嘗試、市府單位間協調與市長的政治意志等。至於，都市政策的死亡與都市象徵的開始，作者進一步分析其特性，認為這是全球化台北的一種重新界定公共性的過程，再現了都市政治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以為本文結論。

關鍵詞：都市政策、老市中心與內城、再發展策略、都市政治、公共藝術、台北市

ABSTRACT

This paper pays attention on the strategies for urban redevelopment and their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public art in globalizing Taipei. First,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project of “turn over the axis” proposed b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April 2004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inclusion/exclusion and the shadows of spatial segregation. This urban redevelopment strategy was called “the Plan of Cultural Park of Northern Da-tung”. Then, the context of project formation, the cont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re analyzed. Expectably, the local residence resisted the project due to the technical omission of “the Confucius Cultural Park” and the typical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t ideas of the Trinity of the Confucius temple, the Da-lung primary school and Pao-an Gong. After that, the political will of the major lack worthy succession and the input from the different directors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were withdrawn. Therefore, the public art project of Da-tung Sewage Disposal Plant promoted by the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of Taipei Municipal Government was almost like a forgotten soldier in the trench. Finally, the reflec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the spatial symbolic expression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urban policy, old city center and inner city, redevelopment strategy, urban politics, public arts, Taipei City

2005年8月7日，記者楊正敏(2005)在聯合報上引用學者對市長的批評：「看出東西發展不平衡，卻無執行魄力」。新聞的大標題是：「北大同文化園區，規劃兩年沒動」。北大同園區計畫確實是馬英九市長看到台北市老市區沒落，提出東西軸線翻轉的政策主張中最具代表性的都市規劃案，也可以說是台北市在全球化年代，一如世界上的許多城市一樣，所提出的都市再發展策略。以下，作者對北大同園區計畫的形成、主要內容、以及執行過程，提出分析，尤其，針對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中的一小部分，大同新世界公共藝術案，也就是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作者就空間象徵的角度，在結論中提出進一步的分析。

一、翻轉軸線的都市發展策略—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

(一) 形成的脈絡

「大同新世界公共藝術案」其實是「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的一部分，而「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又是台北市政府的一個龐大計劃，至今仍是一項理想的都市計畫主張，市府自己宣稱，以及也被稱為「翻轉軸線」。「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是台北市「翻轉軸線」都市再發展策略之一，計畫形成的脈絡是在2003年6月左右，但早在六、七年前便已出現翻轉軸線相關的一些意見。當時，面對台北市市長選舉，一些大同區的地方意見領袖，例如保安宮的廖武治董事長等，基於台北市的老市區在都市發展過程中被市府的重大市政建設忽視已久的緣故，建議馬英九市長應該強調「翻轉軸線」的都市發展政策，

馬市長也採納了這些意見做為競選政見。

1. 全球城市的吸納與排除問題在都市形式上的表現

從城市的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當前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除了其在經濟接合、城市競爭力等正面、獨特的表現外，也都同時面臨了全球城市出現社會吸納與排除(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問題，亦即城市發展中出現兩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跟不上發展的老舊市區會因此脫落為被遺忘的角落。而台北市正也面臨了市政建設過程中老市區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可以用表現在都市形式上的兩個例子做為一種概括性的說明。

首先是切過老市區的環河快速道路，對老市區本身而言，這條快速路就如同一把利刃，切開了淡水河跟老市區的關係。這種被切斷的關係並非是近幾年才出現的，而是自日本殖民時期就開始的，台北市與河的關係從殖民時期起就已被切斷了。清代的台北市街，如艋舺與大稻埕，基本上都是面對淡水河的河港聚落。艋舺(萬華)、大稻埕的主要廟宇取向，或是與街道的關係上，都是面向淡水河，沿岸也設有碼頭，漢人便是從這裏上岸，城市也因此發展起來。然而，到了殖民時期，城市建設的思考角度改變了，同時也影響了城市面對河流的方向—淡水河儼然是一條大排水溝，所有台北的城市廢水都排向它，淡水河因此成為台北城「背對」的河流。

之後，台北的都市發展在都市形式上的表現，基本上就是一個偏心的發展，也是一個中心轉移的過程。城市逐步由臨淡水河的河港城市往東而去，經歷了西門町、衡陽路、中山北路分別作為市中心的階段，1980年代崛起的東區與信義計畫區，不但強化了台北市都市形式上的市中心轉移過程(註1)，而且營造了「台北101」世界最高樓，可以說是全球化台北的都市中心性(urban centrality)再建構的過程(註2)。而台北的都市基礎建設基本上也都是強化這樣「背對」河流的關係，例如防洪的鋼筋混凝土防洪牆再加上環河快速道路的建成，其實只造福了駕車的道路使用者的通過性需求而已。除了留有兩處快速道路出入口之外，老市區與河流的關係，

被快速的車流所切過，不要說水上運輸、臨水岸的休閒服務與開放空間品質，就連起碼的視覺關係也失去了。

其次，大龍峒四十四坎建於清嘉慶7年(1802年)，南北各22間店屋，由鄭、陳、蔡、王、高、林、周、蘇諸姓合資，於保安宮西側成立商號，市街西端丁字路口則為土地廟(李乾朗、康諾錫、俞怡萍，1997:25)。以這間哈密街口丁字路的土地公廟為例，土地公廟是台灣漢人聚落中重要的街廟與村廟，可謂漢人對空間佔有與介入的指標(鄭水萍，2005;2007:117-172)，如今，雖然這個位於丁字路衝的土地公廟仍然存在，但卻已經不復當年的古樸氣息。它面對的道路拓寬了，周圍大龍峒四十四坎附近的店屋所剩無幾，並不是傳統的店屋建物類型(shop-house building typology)而是1950-60年代之後翻建的「販厝」(家宅開始成為現代的商品)，人車依舊雜亂，由土地利用的活動類型、建物維修狀況、以及空間表現的品質，仍然可覺察此地已不再是中心區市街而是相對的都市邊緣。地區本身在都市建設上受不到政府的重視，相較於台北東區，難掩一種時不我與的「被排除與被放棄城市」的氛圍。

2. 空間隔離陰影對都市服務與建設的警訊

今日所謂的北大同或是大同區的大龍峒，原為凱達格蘭族的巴浪泵社，乾隆年間泉州府同安縣移民入墾者眾，此地稱為「大隆同庄」。這裡是漢人進入台北盆地的入口，也是今日所謂的台北老市區的一部份。相較於新興的東區，以台北101大樓為代表，北大同或是大同區的大龍峒就越發顯得老舊，是城市中衰頹的地區。而當年在市長競選時所提出的「翻轉軸線」政策，其實就是要打破過去的發展侷限與建設偏失，尤其是要突破最近幾年在全球城市發展趨勢中，一種越來越浮現出的現象：空間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空間隔離的陰影在都市服務提供與建設上的警訊意義，即在於不能將主要的都市建設與服務提供都集中在少數地區，而讓老市區繼續凋零，因此要進行「翻轉軸線」來矯正此一趨勢。

(二) 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內容

1. 目標、構想與實行策略

面對「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本身，這是 2004 年 4 月由台北市都市發展局所提出的方案(註 3)。「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首先提出了一個發展願景，繼而界定出目標，並制訂可行的策略，這個策略就是「活化文化資產、打造儒道文化園區」(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4)；在此，「儒道文化園區」有些地方值得我們去注意：或許我們可以接受有些儒家研究的學者的看法，認為儒道在台灣，尤其在老市區，有些價值觀其實根本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都市發展局提出的「儒道文化園區」構想並不容易瞭解，尤其是「文化園區」的意義為何？實際的運作功能如何？又是如何與「儒道」做連結？至今也未有前例可供參考。

「北大同文化園區」的構想包含了軸心，即廟學宮三位一體、觀光軸帶、周邊，以及空間一體的觀點。在這個構想中，北大同計畫在地域上的範圍，是以「廟、學、宮」三個座標為頂點，形成一個核心區，分別是孔廟、保安宮以及大同國小。其中，由北市府管理的孔廟，為此發展計畫中的關鍵核心；另外，大龍國小則是扮演重要的文化傳承角色，舉辦文化活動，如六佾舞(大龍佾舞)等等。而在廟學宮三點的核心區中間，則規劃了一個廣場，兩邊倚靠著大龍國小與孔廟，面對著保安宮，如此，即形成了一個北大同重要的觀光軸帶，一條觀光客可以遊覽參觀的路線。此外，在核心區的周邊，也規劃了如捷運等十幾項的周邊環境、交通整備設施，如勞工局利用承德路的勞工局土地興建勞工文化中心等等(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4)。

「活化文化資產，讓古蹟變成活的！」這是「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規劃的重點之一，亦即以文化資產(cultural properties)作為基礎，例如以保安宮、孔廟等古蹟作為基礎，來發展文化觀光旅遊產業，希望藉此帶動老市區的發展，使北大同成為「儒道文化園區」，繼而帶動北大同地方文化與經濟的發展(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4)。運用既有的文化資源來振興地區文化產業是此計畫的重要關鍵，它可

以創造地區特殊的風貌、提升一種深刻的文化氛圍、改造公共環境，並提升市民休閒的空間。總而言之，「儒道文化園區」即是要振興地方產業發展，提高大同區這個老舊市區的生活環境品質。

這是一個理想的構想，推動的市政府知道，還需要軟硬體雙管齊下的運用，才能達成目標。於是，在硬體方面，包含了都市計畫、都市景觀、都市更新，以及公共環境等的規劃；軟體方面，則是需要促成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的再生(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4)。如今，發展文化產業已是全球化趨勢下的一股將文化產業化力量，台北也不能免之；在台灣，這已成為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識，也都看到文化商品的無窮前景，與其在經濟價值上的重要性。廟學宮所運用的策略即是促成文化產品的地方生產，以及創造無可替代的文化觀光氛圍，如規劃季節性之文化傳承的藝文活動。然而，在此會出現一個根本問題：要如何將「孔子」商品化，以儒道來發展文化產業？要發展儒道的文化產業是個不容易由發展局本身獨立來推動的工作，必須有良好的配套與經營策略，譬如說，必須配合相關藝文活動的展演，增加儒道文化與民眾接觸的機會，甚至，還要加強儒學教育的推廣，在生活中落實儒道理念等等。

2. 推動機制與專案推動小組的組織

最後，這些構想實現的另一關鍵，即是推動機制的制定。市政府也知道，倘若只憑藉政府單方面的力量去推行是很難奏效的，因此必須講究行銷策略、採取當前正當令的經營模型--公私合夥策略，並配合政府編列充足的預算經費來施行(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4)。規劃的正文說明相當動人。值得注意的是，「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並不是一般性的計畫，必須由政府來主導推動，也由於其構想架構的龐大，北市府因此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由馬英九市長親自擔任召集人、都市發展局長擔任執行小組的秘書、串連各級局科室單位，確認行動方案，定期開會，將各部門的責任劃分清楚；另外並邀集大同區的社區組織，以及嫻熟、瞭解北大同地方事

務的專家學者參與計畫討論，陣容可說是人馬齊備。若如此按部就班地實踐，成功似乎是指日可待。

(三) 檢視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與執行

1. 計劃本身的技術疏漏

「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固然有著立意良好、規劃完善的構想，但許多問題仍舊需要從執行過程中去探索，才能掌握計畫在現實中真正運作的過程。首先，以技術層面來看，「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本身有其技術疏漏之處，亦即：儒學教育的核心究竟為何？何謂廟學宮三位一體？

台灣最早的孔廟是在台南，而由於台南是明清台灣的政治中心，因此台南孔廟的規模可謂全台第一。之後，在台灣中部彰化也興建了孔廟，彰化做為鹿港這個商業貿易港市背後的行政中心意義，即是漢人移民城市賦予「彰顯皇化」的文治教化意義。到了殖民時期，台北鄉紳主動爭取興建孔廟，同時，殖民者也希望以興建孔廟的手段，逐步確立台灣社會的殖民秩序，平息台人的反抗。而台北原先並無孔廟，經殖民時期日本人支持，由地方鄉紳出面建造孔廟，讓台北「秩序化」。興建孔廟的目的，是因為孔廟有助於維持地方社會安定，方便統治與殖民管理；此外，殖民者在孔廟旁邊還建了一個派出所，後來稱為蘭州派出所，這個派出所突出於四十四坎市街、保安宮後部位置。它兀自獨立在街道空間的尾端，立面向南，成為大龍街的端景，有監視市街的效果。這種空間模式是殖民城市公共空間的一種典型，台北市城中區公會堂(中山堂)與旁邊的警察總局的關係如出一轍(夏鑄九，2002a；2002b)。我們可以說，孔廟旁的派出所，正是一個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建構的「監控之眼」(the eye of surveillance)(註 4)。

要成立何種形式的儒道文化園區，是個必須小心處理的議題，倘若沒有細緻面對構想落實的執行過程，便容易成為空洞的主張。要真正成立一個文化園區很困難，過份被形式化的儒道文化也很容易與社會現實脫節；而要將儒道文化園區變成一種文化產業，除了觀光客參觀孔廟之外，還需要進一步

地加以轉化的活動設計策略，進而創造經濟價值，這個轉化過程是關鍵，也有相當的難度。

另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如何透過政府制度的機制來落實執行。這時，教育單位的角色極為重要，例如大龍國小的學生要學六佾舞，除了是每年祭孔活動的表演者之外，也同時藉由參與文化活動來達到對參與者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許多學生長大後都表示受用無窮。對這些學生而言，儒道文化倒是真正的實現在生活中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大龍國小，台北其他學校與儒道文化並沒有直接關連，因此，要如何推廣落實就是一項很大的工作，而這單憑大龍國小一己的力量是無法做到的，必須藉助市政府教育局等機構的政策來執行落實。

另外，儒學也需要作研究，許多研究儒學的專家學者認為市政府無能提供這方面的研究，而是應由大學相關研究系所與研究機構著手合作，配合政府編列經費運作，同時，也不應限制研究中心的區位必須位於大同區孔廟。當然，大同區可以另外規劃一些制度，如成立社區大學，聘請教授前來開課，或是由研究中心、大學、以及社區結合，推廣儒道文化。如果市政府無法獨力做到，就必須與中央政府配合來推動。在 2004 年的台灣，政治上儒道文化早已不復重要，即使是政府表面上的說辭也不存在了，規劃者必須面對此事實，否則一切只是空想，而且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與文化衛道人士不切實際的幻想。

更重要的是，私部門如何納入？以及，地方社會如何積極地回應？「翻轉軸線」原先的用意是要大同區受惠，大同區的地方產業與社區組織如何回應「廟學宮三位一體」的構想？這更是一個難題，亟需接合地方產業與草根社區的真實需要。如果不能面對以上種種難題，即使有完整的計畫書，也將窒礙難行。

2. 可預見的更新區居民反彈

為了廟學宮一體，學者辛晚教教授因而提醒：孔廟周圍的房子將來會蓋越來越高，屆時高樓將破

壞孔廟中庭的視野，而孔廟中庭是既是活動的核心，有保存其空間完整性的必要，因此，最好能進行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計劃，徹底保護重要的孔廟中庭空間可能遭遇的威脅。urban renewal，在台灣翻譯為「都市更新」，今天全世界的規劃師們都知道，歐美的規劃史告訴我們，都市更新政策的執行過程造成這是將窮人趕走，政府幫房地產炒地皮的同義詞，容易引爆反都市更新的運動，在歐美1960-1970年代曾有慘痛的教訓。至少在美國的教訓是，原先立法的人道主義者的美意，以清除貧民窟(slum clearance)，改善老的都市中心衰頹窳陋地區的、貧窮的少數民族的聚居區的環境品質的目標，在政策的形成與執行過程中受到了扭曲。經由地方政府與房地產開發者的執行過程造成的結局，卻是將窮人排除，引入中產階級。結果，在各大都市區都引起了強悍的反都市更新的運動與以珍·賈可柏(Jane Jacob)女士的反擊，也使得都市更新一詞，幾成為髒字眼(註5)；然而台灣的專業界與政治界似乎一直不太明瞭它的含意，以為如同表面字義上的理解一般簡單，甚至只是都市形式上的除舊布新而已。因此，曾有構想花費八億元徵收孔廟東側土地，遷走孔廟旁邊原本居住的兩、三層樓的居民，利用一部分的空地來建造孔廟的碑林。這樣的大規模拆遷構想在清代與殖民時期也許容易做到，在1950-1960年代的台灣社會也可能不容易引起反抗，但在今天的台灣社會，都市更新卻很容易遭遇大麻煩。果然，都市更新的政策，造成了位於孔廟東側更新區的居民的反彈。另一方面，市府在這之前對都市更新可能造成的居民反彈也有了錯誤判斷——起初在府內開會時，即有大同區地方人士預測會有2/3的居民反彈；但卻有學者說2/3居民會贊成，而市長採信了後者。而不幸的事是前者才符合現實。不過坦白說，就台北的反都市更新運動的經驗，與之前十四、十五號公園等抗議的規模相較之下，這次居民的反彈規模其實並不算很大。我們仍然可以這樣說，市長的決心其實才是執行過程考驗的關鍵。

3. 政治阻擾與專案小組退縮

然而，這次居民的反彈卻引發了一種擴大效

應，使國民黨籍的市議員陳玉梅得以串連一群議員，包括了早就等待著找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市長差池的民進黨籍的市議員，對市府在孔廟東側的都市更新政策進行杯葛，形成相當的政治威脅。而馬市長對這個計畫的政治意志，在經過市議員連線的強烈反對之後(註6)，加上前述的幾點原因，市長就開始退縮。對專案小組言，身為召集人的市長態度是關鍵，因此，市長的遲疑，也連帶地造成屬下其他各局、科、室執行單位態度相繼退縮，最後，專案小組幾乎可以說是潰不成軍。只剩下一些都市發展局本身所推動的零星硬體建設，如修整路面等等看不到與軟體作搭配的實質建設，仍在進行。

4. 政治行動失敗之後市府計劃展開的另一契機

對於「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都發局其實作了不少相關的研究報告，如孔廟周邊環境建築景觀研究報告、孔廟觀光路線如何規劃等等，但到最後卻仍然演變成潰不成軍的結果，這固然是典型的實質環境決定論造成的失誤，更是市府的文化產業方案與振興地方經濟政策過於脫離現實，缺乏針對計畫內容方面的制度設計，這在未來市長選舉時將成為麻煩，會成為質疑其「能力」的要害。在幾年前的市長選舉，代表國民黨參選連任而大獲全勝的馬英九市長就只有在大同區是輸掉的，即使馬市長不需再投入市長選舉，對更上層樓的政治人物言，大同區的支持度仍然是必須注意的事情。第二，這時，僅僅作為「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的一小部份，由文化局負責公共藝術節已經著手上路了。然而，文化局的角色卻十分尷尬，因為上位領導者已經退縮了。這好比是在城市的戰場上奮戰，戰爭已宣告結束，文化局卻像是被遺忘在戰壕裡的小兵，設若類比城市不是戰場而是舞台的話，那麼，文化局就像是在被忽視的舞台一角飲泣的小演員，獨撐結局。

然而，這結果看似悲觀，卻不失為一個「眾裡尋他千百度」的新契機，尋找意義的契機。換個角度去體會「空間之詩」，建築、公共藝術或是文化，它們都是得要用身體去體驗的、空間的文化形式的象徵表現，本來就是很難實現的高層次文化任務。

它們是空間之詩，這種象徵表現的詩意，經常是在失敗行動的姿態中才得以展現出它的深深刻意；這也就是說，政治上也許是失敗的，但藝術上卻可能是成功的表現，失敗行動的姿態反而經常是優美而意味深長的。因此，全球化台北的都市再發展設計策略的死亡，也許是「大同新世界」(Utopia of Togetherness)公共藝術的開始，一種從來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的文化花朵的誕生。整個行動既然在真實政治上已經死亡了，或許在其臨終之時，反而有機會展現了意義，留下詩意的終局。或許，公共藝術倒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了自身，讓我們進一步討論它。

二、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登場——大同新世界

作為「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的部份的，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推動的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大同新世界」登場。因為公共藝術的百分之一條款，迪化污水處理廠有了設置公共藝術的機會，總經費約在 3,000 萬左右，也產生了「大同新世界」公共藝術計劃。此外，衛工處下水道工程處，在污水處理廠周邊做了不少考量社區服務的設施，包括網球場、屋頂花園及通往淡水河邊的橋樑等等，衛工處下水道工程處在公共藝術計劃的部分也與文化局的公共藝術計劃配合得宜，這種態度值得肯定。

「大同新世界」從捷運站延伸至污水處理廠的路線是條關鍵動線，沿線規劃了許多公共藝術的設置，臨時或是永久的作品皆有。這次設置案的策劃者是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公司，預算大約是 2,700 萬。這個方案重新界定了城市的公共空間中的公共藝術。比如說，公共藝術設置的標準為何？執行過程如何？經費要如何核銷？市府所扮演的角色又是為何？等等一些問題，都是一些非常難以處理，也是必須要被注意的課題。第二，是基地與社區特色的問題，這裡是長期被忽視的老市中心，是邊陲之地，是被過去粗陋的都市建設所干擾翻攪的地景，所以環河快速道路切過社區與河流之間，防洪高牆阻絕視線與親水活動，甚至包括了龐大的污

水處理廠本身，它們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些建設表面上看來都是必要的，但對老社區本身言實際上卻是破壞。這種「創造性破壞」其實是「破壞性的創造」(destructive creation)，造就了台北市混亂的都市形式。這種現象不只是台北市與大同區如此，台灣其他地區也都有類似的問題，只是大同區更清楚地表現出這種特性。雖然如此，但是不能忘記，大同區之內卻仍有全台修復最好的文化資產，如保安宮。整個保安宮的保存，由廟方自行雇工購料，要求品質，實報實銷，完全自力修復，沒有向政府申請一分錢的補助。保安宮中庭在修復之後拆除了長年遮蔽中庭天空的防雨鋼架，讓信眾重新看到正殿的立面，為華麗的重簷顯(歇)山屋頂所驚豔。尤其，正殿中庭的夜景配上燈光效果，很吸引市民與遊客們去一探究竟。

(一) 大同新世界的個案

目前大同新世界有些正在執行的案子是極具意義與巧思的。由於篇幅，以下僅以幾個案例做為說明。

1. 蘭州派出所做為異質地方建構

在殖民時期，蘭州派出所彷彿是統治者的「監視之眼」，監視著當年漢移民居住的大龍峒四十四崁市街。在清代的無主墓仔埔基地上，殖民者在明治時期蓋了派出所，光復後因為蘭州街(後來又改為大龍街)的原因，改名蘭州派出所(註 7)。蘭州派出所的右邊，隔著巷子就是保安宮，另一邊則是公學校(大龍國小)與殖民者支持下所建的孔廟，**這種緊張的空間關係是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策展單位組織了一群藝術家，以「同」為聯想的起點，改稱為「無憂國藝術派出所」(江洋輝，2005)，策劃了一個「我們同一國」大使館(Embassy of Wetogether Republic)，這件作品可說是一個突破：是哪一國派來的大使？--是「我們同一國」這個虛擬國度。這個公共藝術幽默地嘲諷了台灣當前政治上因國族認同的分裂所造成的兩岸緊張與台灣社會藍綠對立與社會撕裂現況(註 8)。對浮現中的台灣市民社會言，這是一種具有

反身性能力(reflexive capacity)，看到自身的異質地方(heterotopias)的建構(註 9)。此外，用來裝飾派出所的色系是暖色調的橘紅色，是為了配合孔廟與保安宮，一改過去的派出所立面空間形式上的突兀，一種賊亮亮白色磁磚貼滿混凝土樑柱襯托著紅色水泥漆牆面與無特性的鋁門窗開口，顯耀出粗糙的現



圖 1 蘭州派出所



圖 3 江洋輝，我們同一國大使館

代建築格子，與保安宮與孔廟的空間形式完全沒什麼關連。即使 2004 年保安宮利用大龍街在做醮時，華麗繽紛的祭典，在保安宮與孔廟宮牆之間進行，正後方的蘭州派出所粗糙的現代理性格子，也是格格不入(圖 1, 2, 3, 4)。



圖 2 保安宮建醮



圖 4 江洋輝，我們同一國大使館細部

2. 迪化污水處理廠的空間品質改善

藝術家成功地運用似水波紋又似指紋的設計暗示水的主題來創作污水處理廠的入口(顏名宏，2005)，旁邊並以鏤空的金屬題字表明附設運動休閒公園，重新調整入口所必須的、直接與暗示的意義，既不傷害到污水處理廠的現實要求與既有噴水池的雕塑，同時，也置換了原先未經設計的題字與不合時宜的燈具。可以看出處理手段細膩，新增的設計改善了原有入口，卻與原有物件互不衝突，這是值得肯定的公共藝術模型。

另外，台北市的陸橋往往是粗糙而破壞街景

的，而藝術家將污水處理廠通向淡水河的陸橋以木料重新封包起來，結合座椅、欄杆的變化，製造出臨河眺望的身體感受，藝術家稱為：大地重現(林龍如、熊宜一，2005)。在橋上一特別是夕陽西下時的視野，是台北市過去忽視已久的身體經驗，而回身，在幾乎永遠壅塞的環河汽車車陣之上，上下對照，我們還可以放鬆地回首北望，看見清代台北城所依靠的，北邊面天山、七星山、大屯山漂亮的剪影—城市就像是一個身體，而這就是城市身體背靠的優美輪廓(圖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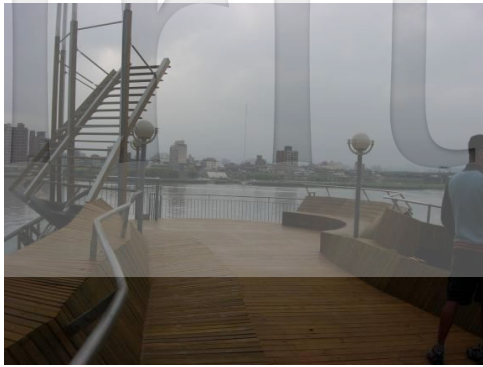


圖 5 林龍如、熊宜一，大地重現



圖 6 林龍如、熊宜一，大地重現，市民使用



圖 7 重慶北路集合住宅高樓側牆，馬賽克剝落



圖 8 葉蕾蕾與啟聰學校的壁畫，我們看得到！

3. 葉蕾蕾與啟聰學校的壁畫呼應熟悉的社區集體記憶

目前啟聰學校的學生在葉蕾蕾老師的指導之下，以馬賽克嵌瓷來裝飾校園裡一面沒有窗戶的高大牆面，這件作品傳達出這些聽不到的學生們「我們看得到！」的心聲，讓啟聰學生獲得表達心情與情緒的管道，也為他們的世界增添更多夢想的色彩(葉蕾蕾，2005)。大壁畫嵌瓷似乎是呼應北大同市民所熟悉的記憶，重慶北路上集合住宅高樓的側牆，馬賽克「成功地」剝落如同抽象表現藝術的作品(圖 7,8)。

4. 孔廟裡經典的數位化表現與女性主義表現

在孔廟中設置有幾件的數位作品，例如，孔廟中有一張桌子，當觀者接近時揮動手掌，即會翻過一頁頁的論語篇章(魏德樂，2005)，我們可以看到新

科技與傳統經典傳達結合，增加了對觀眾的吸引力。或是有一間房間展示女人的價值，嘲諷「唯女子與小人難養」的女性主義作品(鍾文音，2005)，讓我們可以看到近年的台灣社會，女性主義的價值觀已經有能力透過藝術表現，對傳統男性中心的觀點，提出嘲諷與質疑。

5. 裝置藝術趣味化衛生工程的理性

藝術家在污水處理廠辦公室的中庭，設計了一面板子，放映公共藝術在水中創作的過程的有趣影片，使原本單調的辦公中庭變得生動許多，這是裝置藝術趣味化了衛生工程的理性(袁廣明，2005)；另一件作品則是在屋頂上的裝置作品，藝術家將流水、飛機飛過的聲音放大，並使用繽紛的色彩來妝點原有的屋頂(劉國滄，2005)。

6. 躲開鹿港教訓，圖繪巷弄，提供熟悉能溝通的空間語彙與營造措辭

策展人與文化局有意躲開鹿港教訓。這是台灣公共藝術的著名事件，起因為一群藝術家到鹿港去，創作了一尊媽祖像，上面貼滿新台幣，似乎告訴居民「鹿港人，你們醒醒吧！」，嘲諷現實台灣人的貪財。若是在台北，這種創作可能無足為奇，但是在鹿港，並不意外，遭到鹿港人強烈抗議。這次



圖 9 圖繪巷弄裡的家宅牆壁與意義溝通，吉祥如意

的大同新世界小心避開了複製鹿港教訓。藝術家圖繪巷弄，在巷弄裡貧乏的家宅牆壁上繪圖，使用的是居民熟悉的傳統山水畫語彙、在牆上書寫心經，以及，使用如「吉祥如意」等的討喜字彙與營造措辭(李俊陽，2005)。有意思的是，也有居民表達出他們對於繪畫表現的期望與要求，如要求原先黑白設色的孫大聖何不進一步施加彩繪等等。這顯示出居民已經某種程度上認同、接受了藝術家的創作；藝術其實是可以與居民溝通的(圖 9,10)。



圖 10 圖繪巷弄裡的家宅牆壁與意義溝通，要求彩色孫大聖

7. 糊獅頭與獅陣傳統，推廣為「小獅隊」，植物藍染教學，以及，社區營造與散佈全區的社區參與點

還有，糊獅頭與獅陣傳統，推廣為「小獅隊」，植物藍染教學(陳景林等人，2005a；2005b)，以及，透過社區營造過程，確立散佈全區的社區參與點。試舉一例，某個園藝公司放了一個盆景在某處，時間久了，盆景長大落地生根而成為一棵樹，成為酒泉街上唯一的一棵行道樹，而公共藝術的設計者則針對這棵樹，由顏艾琳創作了一首十四行詩，以鑄鐵銘刻，並鑄成樹洞，保護這棵樹(黃瑞茂、吳鼎武·瓦歷斯，2005)。此外，還有孔廟門後的繞樑書聲(駱麗真，2005)、庫倫街上的情詩(顏艾琳，2005)、以飛機為主題的投影創作：「我與飛機」、「全民開飛機運動」、社區居民與公園的互動、大龍峒四十四崁地方商店的歷史、大龍峒指標系統、高架橋下的活動中心、公眾休憩設施等等，做了視覺上的改善(黃瑞茂、吳鼎武·瓦歷斯，2005)。

至於，社區居民會期待的是下一步是什麼？在市府的一些作為之後，社區居民會期待還有下一步發展；我們可以看看黃瑞茂(2005)的調查：

「這一段時間中，發生在蘭州派出所的種種，以及延伸在居民心中的熱烈與期待，最為生動的是所謂「軸線翻轉」的具體經驗，居民甲在地圖工作坊中發展大龍峒社區的美，居民乙因為參加活動而發展蘭州派出所是社區的寶，居民丙默默地將其作品掛在大龍街的電線桿上，居民丁告訴我們她懷念保安宮節慶的掛燈將她心中的期望點亮起來，居民戊不再想要搬離大龍峒，因為找到住下來的吸引力…種種這些，不是因為怎樣的大建設，或是怎樣的政治承諾，或是一些虛飾的社區回應語言。而是因為居民在參與中對於社區的重新體認。」

然而，除了發展局的四十四崁造街舖面的地面

石板鋪設還被執行之外，其他的市府單位準備好再推動下一步工作了嗎？這倒是值得市政府憂心的互動。結果，卻是市府決定拆除蘭州派出所！這是都市發展局要貫徹其規劃構想的主張。

三、結論—執行過程的反思，一點象徵？

總結上述，引伸以下幾點理論討論：

(一) 公共藝術策展人 (curator) 的新專業角色潛力與解除危機作用，以及，文化局的制度性推動角色

首先，專業的策展人是重要的。策展人做為社區、藝術家與市府之間的橋樑，具有催化劑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角色，它的能力在於解除了現代藝術家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間的緊張關係。對台北市的都市經驗言，這一次的公共藝術節的形式是一次嘗試，它的成果主要是文化局的業務承辦人員們與策展人之間摸索與互動過程的產物，專家學者、藝術家以及社區居民在這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把握百分比藝術的機會，目前台灣的公共藝術相關法令已經有足夠的彈性，要避免硬搬簡化的美國模型，要有多樣化可能性，而非「一種」公共藝術而已，在空間中放置一物(object) 而已，甚至，還是非常非常昂貴的，由國外購置的「商品」。這個過程要能成功，策展人的新專業角色與文化局對公共藝術的認識至為關鍵。公共藝術得以敏銳地融入環境，改善基地，營造社區(empowering community)，環境品質得以有機會逐步改善，社會得以更開放，市民才有機會更自在、更自主、以及生活空間更舒服。市民能接近、環境品質得以提升、意義得以賦予、以及競爭意義的溝通等等。策展人可做為社區、藝術家、市府之間的橋樑。

(二) 資本主義城市的文化邏輯與藝術家的張力與潛力

其次，是藝術家的張力與潛力，藝術家可說是

資本主義社會裡十分特殊的社會群體之一，因為他們自己不自覺的敏銳能力，其文化邏輯與作品創新經常引爆社會的矛盾。藝術家與草根社區的距離或是衝突，是需要靠策展人運用其對於藝術的敏感，以及對於社區的細膩規劃來化解危機。藝術家的創新活力與藝術質疑現實的力量需要受到肯定，要能創造社會進一步對話的機會，尤其是跟地方居民之間的對話更是需要的，溝通就是在化解危機，化解社會結構片斷化的危機。例如「我們同一國」大使館，對於台灣社會而言是很有意義的。藝術能夠創造進一步對話的機會，這是意義溝通的開始。我們甚至可以說，公共藝術其實是文化符碼的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它的主要作用是傳達了文化符碼的意義(signification of cultural code)，公共藝術不同於孤立的、個人的藝術表現，如何摸索公共藝術與社區的互動的關係是不容易的，如果不成功，便很容易成為一種藝術家一廂情願的文化騷擾，或者換個角度說，危機引爆；但是，無論如何，溝通對話與意義競爭，還是很值得肯定的公共藝術嘗試，也是當前資訊化資本主義的文化特殊性。這是百分比法案創造了此公共藝術的新契機，是值得把握的機會。公共藝術社區化，比硬搬美國版本的高等藝術(high art)，將之商品化，以很高的價錢引進，既沒有出路，還沾沾自喜強得多。一個負面的例子是「台北 101」天價購置的公共藝術作品，如〈Love〉，如同炫耀性消費，再現的是「台北 101」的消費全球化的意識形態社會區分(social distinction)，也被藝術家批評是凱子浪費的膚淺表現；問題是，它到底區分了什麼？區分了誰與誰的審美價值呢？與此相較，藝術家與社區互動，創作公共藝術，不是更值得肯定的方式嗎？

(三) 公共藝術是一廂情願的文化騷擾？vs. 摸索藝術與社區互動的理想

第三，對比於前述的藝術家一廂情願的文化騷擾，值得摸索藝術與社區互動的理想。傳統民間藝術早已存在久矣，卻未受重視，日漸式微。這其實是與生活同在，因此也一直是最感動人的藝術。現代藝術則不然，它是藝術家的文化表現，至於能否感動社區居民，不是藝術的目的。至於新的公共藝術若能結合與再恢復過去民俗藝術一般的感動地方

草根居民的力量，不是一種值得努力的理想嗎？這也是公共藝術接合社區營造的過程，不過，無論是對市政府文化局、公共藝術的策展人、還是創作的公共藝術藝術家而言，都是艱難的挑戰。

(四) 值得肯定的公共藝術嘗試與市府單位之間協調不足：市長政治意志的考驗？

至於市府單位間的協調，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例如衛工處下水道工程處，就配合得宜。但也仍有許多方面尚待努力，例如發展局似乎不太瞭解儒道文化在現實中的運作，並思考儒道文化要如何與地方產業振興、與相關都市建設作結合，這其實是台灣的規劃專業能力不足的表现；民政局與孔廟管委會就孔廟管理的歸屬問題爭論不休；教育局與大龍國小之間責任劃分不清，期待大龍國小承擔起不可能的任務是不切實際的，其實，建設文化園區的還是應該由教育局等政府單位來主導推動，而非要大龍國小一肩承擔；勞工局原本要作的周邊的環境建設，如勞工文化園區，也不了了之；警局與文化局也曾就相關業務發生衝突…，最後，很可惜，警察局還是搬離了被改造了的蘭州派出所到新建的重慶北路派出所(註 10)；當然，期待台北市政府各局處，甚至是台灣的國家機器內部之間政策的整合，本身似乎就是不切實際的夢想。至於市長的政治意志考驗，我們在下面分析：

(五) 國家能力的弱化的徵候？都市政策的死亡，與都市象徵的開始，一點象徵。

台北市政府卯足全力所推動的「翻轉軸線」政策，可以說是因應全球化台北的都市再發展策略之一，而「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正是翻轉軸線的主力，從政策的形成與專案小組的組成，都可以看到市政府政策致力之處。

然而，執行過程不但暴露了相關局處技術官僚專業能力的疏漏，實質空間的建設與制度性支持之間有巨大的差距，具體表現為各局處間協調整合的困難。

此外，「儒道文化園區」的意識形態想像與現實

的文化產業商品化，振興地方產業之間也有巨大的落差，因此難以執行。

那麼，假如不進行東側住宅區土地徵收，經費壓力與政治阻力都將完全不同。而面對執行的政治阻力，又顯得政治意志不足。這難道是全球化過程中國家能力弱化的徵候之一嗎？這就是說，首先，全球流動中的台灣社會與國家，因認同政治而分裂，而國家的政治動力與經濟動力又有結構性矛盾，以致於，內部則擺不平地方社會的既定政治勢力，再加上，全球資本穿透，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籠罩下，國家再也很難像過去一樣，以制度調節資本的穿透，這是全球化下國家能力弱化的表現。

其次，技術官僚表現的專業能力不足，不能回應社會的期望，在都市治理層次上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專業者的能力不足，說明了專業者的專業技能必須與時俱進，跟得上社會的變化。過於形式化的規劃與設計論述，經常在執行過程中未見其成效，反而造成災難。相對於過去專業訓練的貧困，規劃與設計是簡單化的工程的一部份，台灣也開始有了還不錯的年輕一代的規劃與設計師了。**他們是能與草根社區溝通、對話的專家**，而不是過去的、封閉自以為是的技術專家。對基層的行政與公職人員言，要能懂得分辨與運用、發揮好的專家的技術長處，讓好的專家幫自己的地方做事。不然，都市的工程建設，甚至是教育的工程建設，都會與地方社區的感受背道而馳，不但不能滿足市民的期望，甚至激起社區的抗議，得不償失。

最後，才是市長的領導能力問題。若地方首長具備拔才任命的目光，對政務官能充分授權，對事務官，則尊重行政慣行，然在目標策略的執行與市民服務的成效上，必須貫徹首長意志。若行政責任不能清楚分劃，只求政治上權宜行事，政策的形成與執行過程，面對市民社會的浮現，在都市治理上，必然危機處處。

所以，都市政策的死亡，倒不失為都市象徵的開始，這是剛剛浮現的市民社會活力的表現。對於偶然突破的藝術成果，例如蘭州派出所，確實應該要留下一點曾經努力的紀錄。蘭州派出所，也就是

無憂國藝術派出所，我們同一國大使館，已經獲得了居民的欣賞與使用，每週日在此聚會的南管團體，總是為居民帶來古典幽雅的音樂，吸引居民，與聽得發楞的小孩。這也是社會力量表現在空間形式與公共化權力之眼的歷史里程碑一轉變了監視之眼，成就社區聚會與地方文化的展演角落，也成為反身之鏡。在無憂國藝術派出所門前左手，藝術家許拯人(2005)利用轉彎處設立的交通凸面鏡，將清代大龍峒舉人陳維英，也就是污水處理廠大門對過的古蹟，老師府的陳維英的面容蝕刻於鏡面上。於是，昔日大龍峒的舉人與今日台北市的路人，佇立於轉角處，隔著悠長歲月，回顧前塵，展望未來，同時彼此相望(圖 11,12)。

但是，由於都市發展局的堅持，台北市政府決定了蘭州派出所最終的命運了，在 2006 年 3 月將它拆除了。這拆除是一種「抹去重寫」(palimpsest)--後來的人抹去記錄而重寫。難道連最後的一點騷動的公

共痕跡都留不住嗎？蘭州派出所與市府之後要規劃建設的「六藝廣場」並不衝突，可以結合在一起成為新的文化傳遞中心，市政府卻未能手下留情，長期保留蘭州派出所的公共藝術成果。而孔廟的宮牆有象徵的意義，也不宜以美化之名任意拆除。這是：自己寫不出所以然，抹去重寫必須如此粗暴嗎？還是，要拆了蘭州派出所才能表示有做點事嗎？才能表現施政的決心與魄力，而留下點破壞的「歷史紀錄」嗎？這是市民們對市府失望，「哀莫大於心死」的起點(黃瑞茂，2005)。蘭州派出所公共藝術方案是一種異質地方的建構，反身之鏡，讓我們看到平時難以看到的自身，這是全球化台北的一種重新界定公共性的過程，再現了都市政治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註 11)。然而在台灣，公共空間似乎浮現，卻又何其地脆弱啊？我們似乎有了公共藝術，真是似乎有了，才一轉眼，卻又成為灰燼(圖 13,14)。



圖 11 江洋輝，我們同一國大使館內部使用



圖 12 許拯人，不，純反射



圖 13 蘭州派出所拆除過程



圖 14 蘭州派出所拆除後現況

註釋

- 註 1：關於台北市都市形式的偏心發展過程與市中心的轉變，可以參考夏鑄九、張景森、孫義崇(1987)一份早期的報告。
- 註 2：關於「台北 101」與全球化過程中的在中心化課題，可以參考 Hsia, Chu-joe(2005)。
- 註 3：詳細資料可以參考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4)〈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專案推動小組會議簡報，本文摘要說明簡報資料。
- 註 4：關於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理論概念建構，可以參考夏鑄九(2000；2001)、Hsia(2001；2002)。
- 註 5：關於美國都市更新的教訓，可以參考 Hall(1988: 227-240)。
- 註 6：起初是國民黨籍陳玉梅議員反對，未果；後來則是民進黨籍羅宗聖議員掀了更新說明會的桌子，前後反對意見加成，威脅於是升級。
- 註 7：由於台灣社會政治的轉變，殖民時期的威嚴巡佐已經轉變為和藹可親的警察了，蘭州派出所因為在大龍國小隔鄰，經常成為接送學生時的等候處，而居民也常到派出所內泡茶，建立起鄰居的關係(蘇怡帆，2005a)。
- 註 8：創作者江洋輝(2005)說：「作品裡所謂概念上的真實會關於真實的概念正恰如其份地昭然若揭，而大家最好心照不宣。」。
- 註 9：異質地方是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概念，可以參考夏鑄九(2004)。
- 註 10：警察局一直很不瞭解文化局公共藝術的目標與作法，因為服從市長的指示，又有了較寬敞的新派出所，即使地點不如蘭州派出所地處中心，也有保安里里長連署留下，還是很快地搬到新地點。可以參考：蘇怡帆(2005b)。
- 註 11：蘭州派出所終於在 2006 年被市府拆除了。之後，孔廟圍牆拆除爭議、大龍國校校舍的拆除與新建等等後續的建設方案，果然爆發地方社區的爭議，可謂風波不斷。可以參考對大龍國小校舍建築的抗議連署書與大龍國小校友的部落格：<http://blog.yam.com/dalong4ever>

參考文獻

-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04 〈北大同文化園區計畫〉專案推動小組會議簡報，4月20日。
- 李乾朗 康諾錫 俞怡萍
1997 《大龍峒保安宮建築與裝飾藝術》25，台北：保安宮。
- 江洋輝
2005 〈友好事實：我們同一國(Fact of Friendship: We are Together)〉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Utopia of Togetherness)—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10，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 顏名宏
2005 〈一種接觸的美學(Anfassen=Touch)〉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Utopia of Togetherness)—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1，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 李俊陽
2005 〈幻戲迷牆(Alluring Illusion)〉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Utopia of Togetherness)—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14，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 林龍如 熊宜一
2005 〈大地重現(Reborn Terrain)〉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Utopia of Togetherness)—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2，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 許拯人
2005 〈不，純反射(Reflection, and Yet)〉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Utopia of Togetherness)—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11，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airiti
袁廣明

2005 〈泳池的聯想 (Associations with a Swimming Pool)〉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1,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黃瑞茂

2005 〈沒什好抗議，只是哀默！—記蘭州派出所拆除決策〉《蘭州熄燈誌》2。

黃瑞茂

吳鼎武·瓦歷斯
2005 〈引導一段無法到達的旅程〉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3,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駱麗真

2005 〈朗朗 (Loud and Clear)〉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9,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顏艾琳

2005 〈給大龍峒的情詩 (Love Poem for Dalongdong)〉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8,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鍾文音

2005 〈我的阿嬤學堂—在桌椅與化妝鏡之間，重返凝凍的光陰 (My Classroom of Grannies: Return to Frozen Moments among Tables, Chairs)〉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9,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劉國滄

2005 〈聽見水聲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Water)〉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

《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2,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魏德樂

2005 〈孔子新說2005 (Confucius Says 2005)〉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3,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陳景林 馬毓秀 林明賢(指導) 社區居民天染工作坊(協助)

2005a 〈大地本色 (How the Earth Really Looks)〉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7,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2005b 〈旗立·綺麗 (Splendid Erection of Flags)〉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8,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葉蕾蕾 (Lili Yeh)

2005 〈我們在天空飛翔 (Roaming in the Dreamland Sky)〉木石研室內建築空間設計編《大同新世界 (Utopia of Togetherness) — 第二屆台北公共藝術節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藝術家作品簡介》2,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楊正敏

2005 〈北大同文化園區，規劃兩年沒動〉《聯合報》8月7日。

夏鑄九

2000 〈殖民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台灣社會研究》40: 47-82。

2001 〈植民地近代性之構築〉本田親史、巒田龍藏譯《現代思想》29-6: 23-60。

2002a 〈公會堂與大稻埕南街：殖民城市的中心廣場與反殖民城市的對抗性都市空間狹縫〉《視界》8：32-37。

2002b 〈公會堂與大稻埕南街：殖民城市的中心廣場與反殖民城市的對抗性都市空間狹縫〉人間副刊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156-163，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2004 〈古蹟保存做為一種異質空間的營造〉(Historic Conservation as the Constitution of Heterotopias)，歷史建築與藝術空間國際學術研討會(AICA2004 World Congress in Taiwan, Symposium II-Kaohsiung)主題演講論文(Keynote Speech Paper)，高雄市，12月6日。

夏鑄九 張景森 孫義崇
1987 〈台北市都會轉化研究的一個早期摘要〉(An Early Summary of the Study of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aipei)，都市發展與文化傳統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10月。

鄭水萍(演講)
2005 〈土地公、村廟到聚落空間—土地邏輯與土地信仰〉，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公館101，6月24日。

2007 〈台灣民間社會的場所精神—從傳統到都市‘土地公’的地方多元詮釋版本〉《城市與設計》17: 117-172。

蘇怡帆
2005a 〈蘭州派出所的前世今生：訪問大龍峒最資深的巡佐—謝深山先生〉《蘭州熄燈誌》2。

2005b 〈蘭州派出所的前世今生：訪問蘭州派出所的副主管—康昭太〉《蘭州熄燈誌》2。

Hall, Peter
1988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sia, Chu-joe

2001 “理論化殖民建築與城市：台灣的殖民現代性營造”。Hanoi au miroir des metropoles asiatiques, dans le cycle des metamorphoses, au regard des metropoles asiatiques, Sous le Haut Patronage du President du Senat Avec le concours de la Region Ile-de-France, Colloque organize par l’Institut francais d’Architecture et l’Institut parisien de recherche architecture urbanistique et societes, dans le cadre du reseau de la recherche architecturale “Metropoles d’Asie-Pacifique”, Palais du Luxembourg, Paris, 13 Sept.

2002 “Theorizing Coloni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Building Colonial Modernity in Taiwa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3(1): 7-23.

2005 “Rebuilding the Urban Centrality and Taipei 101: The Landmark of Space of Flows in Global Metropolitan Nodes, Or An Empty Skyscraper of Lawrence’s Curse?”. The 4th International Critical Geography Conference, Mexico City, 8-12 January.